

● 党建要论

延安时期党加强纪律教育的历史经验

刘宗灵 严静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加强纪律教育是以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纪律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重温这一时期党的纪律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具有重要意义。

纪律教育是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的必要环节。全民族抗战初期,在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示下,党组织和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但因绝大多数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长期战斗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党的基本理论知识教育,党内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和不良作风,危害了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必须“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这“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陈云指出,“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将纪律教育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内容,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反对自由主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等与党的纪律建设相关的文献列为整风学习必读文献,这不仅有效增强了党员纪律意识,规范了党员干部行为,还有力调整了党内关系,对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具有重要意义。

纪律教育是提升新党员新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手段。提升党性修养,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终身课题,是加强纪律教育的内在要求。延安时期,部分新党员新干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党性观念薄弱,一些人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服从党的工作分配。陈云在《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一文中指出,“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缺点或多或少助长了他们的不良思想”,其中一个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经探索,形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纪律教育的依托载体、教育方法等层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一系列制度性要求,以及结合理论学习和整党整风运动来加强纪律教育的形式,体现出延安时期党的纪律教育在运行机制上具有集中性学习和常态化教育相结合的特征

表现即为“组织生活多流于形式主义,忽视真正的纪律教育”,并着重提出了“加强纪律教育”的严格要求。他认为,党内加强纪律的教育特别重要,一是因为“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二是因为“共产党员遵守党的纪律是胜利的必要条件”,三是因为“我们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民众团体中工作着,他们行为的好坏就立刻影响到人民对共产党的观感”。只有加强纪律教育,党员干部才能真正增强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树牢群众观念,增强党性修养。

纪律教育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顺利贯彻和执行,需要以纪律教育为前提和保障。毛泽东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1946年7月12日,在给“各局,转各部队首长”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要求“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对由于事先忘记和在开展新的行动时未进行纪律教育、教育时未采取认真的严肃的态度、仅使少数人知道而未能由部队首长举行全体讲话等行为进行严肃批评,并指出“责成政治机关对此予以检讨”,“加强一切部队的纪律教育,是为至要”。这是军队上下团结、坚决执行命令,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落地,从而夺取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效拓展了纪律教育的内容、方法和机制,促进了纪律教育体系的多维建构。

明确纪律教育的内容定位,严守党的纪律。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应该根据“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陈云认为,加强纪律教育就是使党员干部“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犯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是真正遵守纪律的体现和反映,“党不容许任何党员在党的决议面前有‘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延安十三年,党对各类纪律,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地下工作纪律和经济纪律都作出了进一步的严肃规定,并依据特定的革命运动或活动开展相关纪律教育,如土改纪律教育、进城纪律教育等,为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提供了思想和行动保障。

拓展纪律教育的方式方法,增强教育实效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经探索,形成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依托载体、教育方法等层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一方面,通过发挥以党报党刊为主的宣传载体的教育作用和以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为主要组织形式的活动载体的指导作用,不断深化全党全军对党的纪律原则的认知。这一时期,《解放》、《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群众》、《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报刊创刊,负责领导党内教育的各级组织机构建立起来,如中央干部教育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在根据地办的党校、训练班、政治军事学校等,使党员干部对党的纪律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增强了其遵纪守法意识。另一方面,系统运用警

加强诬告行为治理 为清白干事者撑腰

维护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不让担当者因受到诬告而蒙受冤屈、心灰意冷,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心无旁骛、放开手脚,全心投入为党和人民服务的事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阮一帆 史晨旸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部分强调:“加强诬告行为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七个有之”问题中,就有“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意保护那些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干部,对那些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诬告是采取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等方式反映问题,意图使他人受到不良政治影响、名誉损失或者责任追究的行为。实践中,诬告行为造成了不少损害和不良影响。如导致被诬告干部在提拔晋升、岗位调整、干部交流、评奖评优时错失机会,对其身心健康、家庭、工作状态、干事积极性造成消极影响;干扰正常反腐途径,扰乱党政机关正常

工作秩序;相关机关和组织在甄别、调查过程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给本单位和本部门的政治生态、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干干净净的上下级关系造成消极影响;等等。

诬告行为破坏了政治生态,削弱了党员干部投身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必须对诬告者挥利剑,对此类行为保持“零容忍”态度,决不让诬告者图谋得逞、逍遥法外;必须为实干者铸坚盾,为担当者担当、为尽责者负责,维护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决不让担当者因受到诬告而蒙受冤屈、心灰意冷,要让广大党员干部心无旁骛、放开手脚,全心投入为党和人民服务的事业,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严查诬告陷害行为。为有效遏制和打击诬告行为,我国明确相关法律法规,对诬告行为进行严格界定,形成强有力的法律震慑。《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规定,控告人、检举人、证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监察对象的,依法给予处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政治品行恶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言,造成损害或者不良影响的情况作出了处分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明确规定:“党员进行批评、揭发、检举以及提出处理、处分要求,应当通过组织渠道,不得随意扩散传播、网络散布,不得夸大和歪曲事实,更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遏制诬告行为的发生。同时,持续深化惩治诬告行

为专项治理,狠刹诬告歪风邪气,持续营造为干部担当、为事业担当的良好氛围。

二是推动检举控告办理提质增效,弘扬正直风尚。检举控告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也是党员和群众反映问题的正当权利。对于依法依规依法行使检举控告权的干部群众,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和保护,对于故意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的恶意举报者,要依规依纪依法予以严惩。为实现精准处置、高效办理、及时反馈,可建立针对诬告行为的举报和投诉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及时发现和处理诬告行为;建立分类系统,对信息进行快速筛选,区分真伪,并优先处理有根据的举报;鼓励实名举报,对实名举报给予更多的信任和重视,构建良性有序的信访举报秩序;探索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协作机制,实现信息联通、力量联合、案件联查。

三是健全澄清正名机制,构筑干部保护体系。近年来,一些地区已制定并实施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工作办法,明确了澄清正名工作的原则、方式、范围、实施主体和程序、责任分工和纪律要求,增强了工作的规范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还有一些地区建立了“三步走”工作流程,包括研判评估、规范澄清和跟踪回访,综合考虑澄清对象的工作表现、群众口碑、单位政治生态等因素,对失实信访举报进行定期综合研判,严格评估后及时启动澄清程序。做好相关工作,既要审慎稳妥,又要暖心关怀。一方面,要根据澄清对象的意愿、问题性质、影响范围等因素,灵活采取书面澄清、当面澄清等多种

方式,坚持精准规范、审慎稳妥地开展澄清正名工作。另一方面,要实施暖心回访,加强对澄清对象的心理疏导和谈心谈话,帮助他们卸下思想包袱,更好地投入工作。总之,要确保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全方位、多角度关心关爱,确保澄清工作形成闭环,经得起历史、纪法和群众的检验,既有效维护党员干部的名誉权,使其免受不实指控的影响,又鼓励和激励干部积极担当作为,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贡献力量。

四是培植法治思想意识,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从根本上减少诬告行为,需要强化法治宣传教育,曝光诬告行为的不良后果,提高公众对诬告行为法律后果的认识,预防诬告行为的发生。要通过教育和文化活动提升公民的道德修养,培养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减少诬告动机。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相结合,通过法律手段强化道德约束,通过道德教育促进法律遵守,形成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同时,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法治建设和道德修养提升活动;学校要注重从小到大的培养,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和道德观念,为社会输送具备优秀法治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公民;社区要组织法治和道德相关活动,如法律讲座、道德论坛等,提高居民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水平;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企业内部培训和文化建设,提高员工的法治意识和道德修养,营造诚信守法的企业文化。这些措施,既有助于减少诬告行为,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阮一帆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分中心研究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史晨旸单位系汉口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玉山

每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国人身上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便油然而生。统编中国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第一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知识拓展”栏目“国歌、国旗、国徽的由来”谈到,“政协会议在应征的数千件国旗图案中,对上海的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进行修改,然后将它确定为国旗图案。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实际上,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颇为“跌宕起伏”,从图案征集到精挑细选,整个过程充分发扬民主精神,经历了多次会议讨论。

从“参11号”到“复字第三号”或“复字第四号”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国徽方案。7月12日,新政协筹备会制定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条例》。7月15日起,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定的《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在《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等报纸上刊登。启事就国旗注意事项提出要求:中国特色(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为长方形,长宽三比二,以庄严简洁为主;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启事社会反响热烈,一个月内收到国旗应征稿件1920件,图案2992幅,投稿人有干部、学者、艺术家、军人、在校师生、工农群众等。

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中了16幅国旗图案。1949年8月24日,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国旗的整体构图统一了认识:国旗图案中有左上方留四分之一的形式,因与美国和国民党旗帜相似,不拟采用;避免与苏联相同,不采用斧头、镰刀形式;一致认为“初选第十一号”较好,红白二色分配适当,红星在角上,旗不飘开亦能看见,样式与其他国家不雷同,在象征上也适合征求条例;慎重起见,把复选提出可供参考的图案也一并提请常委会审核,共计17幅。8月26日下午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中,第六小组提出,“参11号”国旗图案比较合适。

后来,陈嘉庚对“参11号”提出异议,理由是:与印尼国旗相似;上面白色,在太阳底下看不见;没有表示工农联盟的意义。陈嘉庚认为,最好用中国式斧头、镰刀和星,红旗绝不能配其他白、黄等色条,会让人误解革命不彻底。陈嘉庚的意见起了作用。1949年9月14日召开的第六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达成协议,选出国旗图案第17号和第11号修改图,提供给常委会参考;把来稿中较好的图案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政协全体代表讨论。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编印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38幅国旗备选图案分别标记为“复字第一号”至“复字第三十八号”,同日召开的第六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决定采用“复字第三号或复字第四号”。实际上,“复字第四号”就是上文谈到的第六小组最初比较中意的“参11号”的修正图,只不过上部分的白色替换成了更具东方意义的黄色。第六小组对这两个图案的评价是:构图庄严,简洁美观,涵义基本合乎征求条件。

“复字第三号”和“复字第四号”领跑备选图案

1949年9月23日,政协会议代表被分为11组,专门讨论国旗等问题。认为较好和认为可供参考的放在一起来统计,最终,赞同“复字第三号”的最多,有185人;赞同“复字第四号”的129人;赞同“复字第一号”的112人;赞同“复字第二号”的77人。总体来看,大多数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和一黄条的样式,但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和象征说明略有不同意见。

不管怎么说,“复字第三号”和“复字第四号”的得票率一直遥遥领先。1949年9月25日,九三学社主要发起人之一吴藻溪给周恩来写信,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从光学看,红黄两色在日光和照相中,很难鲜明表现出来,而且在一个整体上画一条横直线,无论这线的起点和终点到头与否,都不免引起一种分裂的直觉。

“复字第三十二号”脱颖而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在分组大讨论的时候,“复字第三十二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原稿大星中有镰刀、斧头,第六小组复选时删去)支持者并不多,只有15人。

1949年9月25日,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周恩来都参会。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特征,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可以有同样之斧头、镰刀,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陈嘉庚和梁思成随即发表赞同意见,紧接着其他与会人员也一并赞成并鼓掌通过。

1949年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拟采用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三十二号图,并改正其说明。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代表着国家的权威和尊严。五星红旗见证了祖国的发展、崛起和繁荣富强,赋予每个人奋进的力量,如今正激励着中华儿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作出贡献。

(作者系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多抓造福人民的工程

张永伟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考察甘肃,在听取甘肃引洮供水工程建设运行情况汇报时指出,引洮供水工程建设得很好,要多抓这样造福人民的工程,切实解决老百姓面临的生产生活问题。为民造福,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多抓造福人民的工程。

多抓造福人民的工程,是“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政绩观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

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要为民造福。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上,而要体现在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中,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新时代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践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就是,牢牢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多抓造福人民的工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多抓造福人民的工程,需要党员干部以“无我”之境界和担当久久为功、一茬接着一茬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满足其需要,既需要立竿见影之“小

而美”,“细工笔”,也需要利在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标志性工程。“大写意”。比如,“引洮河水,解陇中渴”是几代甘肃人的夙愿。引洮供水工程首次启动是在1958年,因当时条件制约,3年后停工,在近半个世纪后再度上马。历经8年艰苦建设,2014年底,一期工程建成通水,后又经7年接续奋斗,2021年9月,二期骨干工程建成通水。最终,总长1069.83公里的干支渠辐射甘肃中部最缺水的5个地级市13个县(区),惠及近600万群众,约占甘肃省总人口的1/4,可谓长远造福人民的“圆梦工程”、重大工程、世纪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要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既要做强功,也要做潜功。政贵有恒。长远造福人民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切实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把握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

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大功。

多抓造福人民的工程,要求党员干部切实提高造福人民的能力。多抓、抓好造福人民的工程,靠的是信仰信念,比的是境界担当,凭的是能力水平。《庄子》有云:“褚小者不可以怀大,铍短者不可以汲深。”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能否在多抓造福人民的工程方面实现新作为,关键看是否具备过硬的素质和本领。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始终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补足精神之钙,筑牢信仰根基,走好“信念之步”;另一方面,要把实践和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自觉到改革发展主战场、重大斗争最前沿、急难险重第一线去拓视野、强本领、长才干,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提升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基地研究员)

● 党史文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如何诞生的